

雅羅斯拉夫·普實克： 學生眼裏的神話與現實

● 高利克 (Marián Gálik)

著名的捷克漢學家雅羅斯拉夫·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於1980年4月7日與世長辭，我不記得那天的天氣如何。那天晚上，我的同事，著名的捷克西藏學家Josef Kolmaš博士，給我來了一個電話：「老先生去世了。」沒有必要特別挑明這位「老先生」是誰：我們都知道，由於他的疾病，這一天遲早會降臨。

我卻清楚地記得在4月14日為普實克舉行的葬禮。葬禮於下午2點鐘開始，那天的天氣美麗極了，是真正的春天時光，街道上擁滿了曬太陽和享受歡快氣氛的年輕人。我放下了手邊的書和文稿（當時我正在撰寫關於魯迅在1903-1908年之間所寫的散文、以及魯迅的《吶喊》的評論文章）。與我母親的去世一樣，普實克之死對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我的母親和普實克兩個人均死於腦溢血。由於在母親臨終以前的日子裏我曾服侍過她，我確切地體驗到我的導師的逝世之震驚。葬禮舉行的幾個小時之前，我閱讀了B. Watson的英譯本《莊子·大宗師》裏的一段：「且夫得者，時也，失

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①

時代之子

普實克酷愛生活。從哲學倫理的角度來看，作為漢學家的他偏愛孔子儒學。然而我們很難確定普實克的人生觀，因為他一生中不斷地改變自己的看法和觀點。當他年輕時，他喜歡「道家的浪漫誇誕和原始奇想」^②，這點我們從他自己於1947年寫的自白中得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後，他目睹了法西斯德國對波西米亞和馬拉維亞所施加的殘酷的獨裁統治，他堅信，建立在暴力之上的政治系統一定會像公元前207年間的秦王朝那樣全面崩潰。普實克不僅是一位傑出的學者、翻譯家和教育家，也是一個富有靈感和充滿希望的人。他是時代之子。據說，在1945年5月某一天，他得到了一把駐紮在東方學院的



普實克攝於60年代

德國黨衛軍丟在一邊的鑰匙，學校的大門從此向他的國家和世界敞開。他曾相信，東方研究的新世紀將在掙脫了法西斯威脅和枷鎖的捷克斯洛伐克開始，在整個東歐和蘇聯開始。他曾經對蘇聯充滿信心，認為它是自由歐洲和亞洲（東方各國）的一個具有未來發展潛力的聯盟。對於他來說，歐洲和東方之間在1938年慕尼黑協約和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產生的深淵，於1945年5月5日被填平了。隨着布拉格起義的第一天，隨着5月9日歐洲世界以及舊布拉格世界的衰亡，隨着由蘇聯和所向披靡的紅軍「輝煌地和無往而不勝地踏平」^③斯拉夫民族之後，歐洲和東方終於可以攜手並進了。這當然

是普實克所犯的致命錯誤。當時多數捷克知識分子與普實克一樣，對蘇聯充滿希望。以後的普實克非常鄙視自己在戰後最初年月中所說的話和所表現出來的態度。「解放」這一詞在戰後的東歐國家裏的含義和解釋是他在自己的「大覺」（《莊子》）時產生的內心痛苦來源。

普實克於1906年9月14日生於布拉格。他最初在阿爾卑斯山脈北邊一所古老的歐洲學校查爾斯大學（Charles University）裏學習古代史，後來他轉而從事漢學研究，求學於哥德堡（Göteborg）、哈萊（Halle）、萊普西格（Leipzig）等地，從師於高本漢（B. Karlgren）、G. Haloun 和

在1945年5月某一天，他得到了一把駐紮在東方學院的德國黨衛軍丟在一邊的鑰匙，學校的大門從此向他的國家和世界敞開。

E. Haenisch。完成漢學課程之後，他想去中國，後來從托馬斯·貝塔(Thomas Baťa)先生那裏獲得了去中國的贊助金。這位著名的捷克工業家貝塔先生希望到中國的龐大市場上去兜售自己工廠生產的鞋子，而普實克則在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和Werner Sombart的影響下，想到北平研究中國的社會歷史。從1932到1937年初，普實克在日本和中國遇到了一些著名的中日學者和作家，例如鄭振鐸、馬廉、郭沫若、冰心、沈從文、長澤規矩也、鹽谷温和其他人。普實克放棄了社會歷史的研究，開始研究中國中世紀的通俗文學和現代文學。他於1937年1月返回捷克斯洛伐克。後來到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居住了一個學期，進修有關中國中古通俗文學的課，這類課程對當時的歐洲漢學界來說是完全陌生的領域。在納粹德國佔領捷克前夕，他回到了自己的祖國。他為自己的經濟贊助人寫了一本中國普通話的課本，書中有多處是關於買賣的會話。他曾在大學圖書館裏任職掙錢糊口。他也同一些熱情的漢學信徒們一道閱讀關於中國文學和哲學的文本。

甚至在他返回捷克斯洛伐克之前，他所翻譯的魯迅的《吶喊》片斷已經於1937年在布拉格發表出版，上面載有魯迅寫的短序，頌揚文學是國際交流的最寶貴的方式。後來，普實克翻譯了孔子的《論語》和茅盾的《子夜》，並於1940年發表了題為《我的姐妹中國》(*Sestra moje Čína*)的旅遊雜記。這本《我的姐妹中國》從未被譯為其它外國語言，這是令人遺憾的事，因為它生動地記載了普實克在當時中國的耳聞目睹。作為一名學者，他主要集中精力研究中古通俗文學，在西

方被公認為是這一研究領域的創始人。他的研究成果起先在*Archív orientální*上發表，後來於1970年以《中國歷史與文學》為標題再版，因此在漢學界一舉成名。

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普實克成為國內外聞名的學者。他最崇尚的知識不是天才的獨創知識。雖然他自己十分有天賦，精通人文學科的許多分支，特別是文學、歷史、哲學，但是他常喜歡用捷克語說：「學問與語詞相聯，需要學習和理解。」^④(*Učenost souvisí se slovem nčiti se a uměti*)。50年代中期以後，普實克更加投入地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他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貢獻比他的中古和晚清通俗文學的研究更為著名，但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這方面，他在各種學術研討會上所宣讀的論文和所教授的各門課程，就像他在美國所做的那樣，則在某種程度上是在過去十多年裏由他自己的布拉格和東歐學生所準備好的。普實克以其發表在歐洲和美國雜誌上的文章和他的著作《中國現代文學簡介》改變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狀況。《中國現代文學簡介》一書於1964年在柏林出版，但這本書的全稿早在1959年至1960年就已經完成。為了要對他的學生公允些，我得說，普實克在那本書中討論魯迅、茅盾、郁達夫、丁玲、郭沫若、冰心、巴金時，他借用與參考了自己第二位夫人B. Krebsova以及其他學生的觀點與材料。他是我們中間最年長者，具有很高的創新的能力，對庸俗馬克思主義的細菌能有或多或少的免疫力。他早年研究過俄國形式主義和捷克結構主義，並受其影響。(當年最好的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文學研究家，例如J. Mukařovský和F. Vodička，是普實

普實克最崇尚的知識不是天才的獨創知識，雖然他自己十分有天賦，他常喜歡用捷克語說：「學問與語詞相聯，需要學習和理解。」

普實克借用與參考了自己第二位夫人B. Krebsova以及其他學生的觀點與材料。他是我們中間最年長者，具有很高的創新的能力，對庸俗馬克思主義的細菌能有或多或少的免疫力。我們是工匠，而他卻是大師。



1933年還是研究生的普實克訪問燕京大學，與冰心(右二)合照，留下這幀極珍貴的照片。當時普實克到北京各地訪問，大概是他時常笑容可掬，中國朋友給他起了一個「笑外國人」的綽號。

克在查爾斯大學的同事。)我們是工匠，而他卻是大師。

論辯·教學·翻譯

普實克的文章〈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主觀主義和個性主義〉^⑤也許是學者們在討論中國現代文學時最常引用的。這是普實克在1956年第九屆巴黎青年漢學家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的一篇論文。M. Goetz在一篇題為〈在西方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發展〉的批評論文中，把普實克稱為「普遍被認為

是本學科的一個真正創始人，同時也是一個治學嚴謹和富有爭議性的學者」^⑥。普實克曾對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寫了長長的一篇評論，夏志清對此進行了答覆^⑦。這一評答成為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性質所進行的最富有刺激性的爭議的起端與終結。

普實克為甚麼會同夏志清進行辯論呢？1960年前後普實克第二次然而也是最後一次對國內和國際上的政治與社會事物表現出極度的熱情(他的第一次熱情始發於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當時，他認為殖民主義的終結和新型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是人類的

普實克曾對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寫了長長的一篇評論，夏志清對此進行了答覆。這一評答成為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性質所進行的最富有刺激性的爭議的起端與終結。

普實克的反現代主義的態度和其對中國現代文學中現實主義傾向的強調，激發了他在美國最出色的學生李歐梵去卓有成效地研究中國現代詩和小說中的現代主義傾向。

兩大希望^⑧。接受殖民主義的終結是可行的，但是命運的嘲諷使他後來承認建設新型社會主義社會的希望是不可靠的。普實克與夏志清之間的爭論中沒有輸家與贏家。然而有必要指出，普實克在他的其它研究裏是更為優秀的，所有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生應該花些時間去閱讀普實克的其它著作。普實克與夏志清之間的辯論在中國文學研究史上有其意義。從如此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觀點出發的普實克與夏志清，促使年輕的學生們更深入地思考文學。也就是在這裏，普實克的神話和誤解開始了。對於許多人來說，普實克對夏志清的評論不論從好的意義上或從壞的意義上來說都是一種挑釁，只有那些熟悉普實克的許多其它著作的人才能够恰當地評價他這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裏，普實克的神話得到了膚淺的闡述和發揮。1987年，李歐梵編選的《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⑨在大陸出版。出於明顯的原因，夏志清對這場辯論的貢獻沒有被收入這部中文版的書中。我想這可能是由於夏志清的觀點與當時的中國大陸文化與文學政策十分不相吻合的緣故。有必要說句公道話，普實克與夏志清在他們的學術對話和偶爾見面時一直保持着友好態度。1963年8月5日夏教授在給我的信中說：「普實克教授幾個月前曾來紐約——儘管他曾經對我的書寫了一篇不友善的評論文章，但他這個人還是十分有魅力的，他對中國文學的瞭解也很讓人欽佩。」

據我所知，當普實克提問題和迫使別人更深入地闡述自己的觀點時，他是最傑出的。例如，普實克的中國文學中「主觀主義」和「個性主義」的觀點引發了許多相類的研究，甚至還有

專著。我所能記起的：R.E. Hegel和R.C. Hessney編輯的《中國文學中「自我」的表述》(*Expressions of Self i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1985)一書中收錄了李歐梵的〈孤獨的旅行者：現代中國文學中的自我形象〉、李歐梵在其專著《現代中國作家的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 Mass., 1973)裏的一章〈情感的旅行〉、C. Ramelb編輯的《傳記：東方與西方》(*Biography: East and West*, Honolulu, 1989)中的Don Price的文章〈作為自傳的日記：現代中國的兩個例子〉、Wolfgang Kubin在其專著《獵虎記：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六個嘗試》(*Die Jagd nach dem Tiger, 6 Versuche zur medernen chinesischen Literatur*, Bochum, 1984)中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中的傳統與現代主義〉一章、由我編輯的《1919年中國五四運動的文學之間與文學內部的方面》(*Interliterary and Intraliterary Aspect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1919 in China*, Bratislava, 1990)裏的Ingo Schaefer的〈五四時期文學中的個性與主觀性的問題〉，甚至還有Janet A. Walker的《明治時期的日本小說與個性主義的理想》(*The Japanese Novel of the Meiji Period and the Ideal of Individualism*, Princeton, 1979)。

另一個例子：普實克的明顯反現代主義的態度和其對中國現代文學中現實主義傾向的強調，激發了他在美國最出色的學生李歐梵去卓有成效地研究中國現代詩和小說中的現代主義傾向，而且已經有人追隨李歐梵一起進行了這方面的研究。在60年代，普實克的態度有些改變，他承認現代主義潮流對中國現代文學有所影響，比

如說波德萊爾(Baudelaire)或勞特利蒙特(Lautreamont)可能對魯迅的《野草》產生了影響^⑩，雖然還沒有適當的證據來證明這一點。

在寫本篇文章時，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任訪問學者，我了解到研究所的翻譯中心自1973年以來有了許多優秀成果，因此覺得，我必須講一講普實克在翻譯領域中的成就。

作為一個把中國文學和哲學著作譯成捷克語的翻譯家，普實克能夠欣賞語詞的價值，以及語詞在語義和美學上的含義。除去以上提到過的三部著作之外，普實克還於1947年和1954年為捷克讀者提供了話本12種，並且翻譯了沈復的《浮生六記》(1944、1945)、劉鶚的《老殘游記》(1947、1960)、《孫子兵法》(1949)，以及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的三分之一的故事(1955)。特別是話本12種和《聊齋志異》是他多年苦心鑽研和深深喜愛的題目。普實克認為，翻譯應該走在漢學研究中每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之前。他始終恪守這一原則。

普實克的儒學觀體現在他對教學的態度上。作為一名教師，普實克願意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特別是在指導研究生上，並且十分認真地閱讀研究生交上來的論文或文章。普實克不喜歡青年中間的多產作家，他強調發表第一部著作的重要性：「如果你的第一部著作寫得很差，」他常這樣說，「那麼以後便沒有人會願意讀你的研究成果了。」

普實克自1953年起任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東方研究院的院長，後來是國際學術委員會裏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的常任代表，有一段時間在國際哲學與人文學科協會中任執行委員會的

成員，並成為該組織的副主席。他還是國際現代語言和文學協會的副主席。他的這麼多職責和工作使他不能用許多時間在大學教學，但我在布拉格上大學時相當幸運，十個學期中有六個學期可以上普實克的課。普實克的密友、連續多年擔任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東方研究院副院長的Augustín Palát教授說：「雖然普實克有這麼多的公共活動，但是他總是抽出時間在大學裏教課，參加東方研究院的普通教師研討會，給主修東方研究的外國學生上課，而且他本人仍然從事廣泛的研究工作。在這些研究工作中，他對自己的要求十分嚴格，同時也要求別人按照他的指示分毫不差地工作。」

原始有為與未來終結

普實克的「大覺」(great awakening)於1963年成為事實。當時，薩特和卡繆的存在主義哲學開始在捷克知識分子中傳播開來。普實克所信奉的浮士德式的情調開始受到了質疑。1964年9月，我第一次出席了青年漢學家的第十六次會議。一天傍晚，我們坐在波德斯(Bordeaux)歌劇院前面，一起品嚐波德斯紅葡萄酒時，普實克對我說，所有人類情感和人類行動實際上是毫無意義的，因為人類的未來已經開始了，並且必將達到其最終結局。但是人類情感和行動對於作為人類個人的我們卻十分有意義，因為那些情感和行動表達了我們的歡樂，也是我們的自我實現。他說這話是在1963年召開的紀念卡夫卡的生平和著作的利布裏斯(Liblice)大會之後。那次會議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化政策和意識形態氣氛起了解凍的作

普實克不喜歡青年中間的多產作家，他強調發表第一部著作的重要性：「如果你的第一部著作寫得很差，那麼以後便沒有人會願意讀你的研究成果了。」

普實克對我說，所有人類情感和人類行動實際上是毫無意義的，因為人類的未來已經開始了，並且必將達到其最終結局。但是人類情感和行動對於作為人類個人的我們卻十分有意義，因為那些情感和行動表達了我們的歡樂，也是我們的自我實現。

用。在那座精美的哥德式的利布里斯城堡裏，卡夫卡的粗野和恐怖的《城堡》首次被公開地宣佈為人類政治、社會和文化生存的一個範例。

早在這之前，普實克就試圖建立東西方之間的橋樑。後來，60年代後半期的布拉格成為許多來自亞洲、歐洲、美國和其它地區的漢學家們的聚會處。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裏，普實克率領一組專家，完成了著名的三卷本《東方文學辭典》(*Dictionary of Oriental Literatures*, London, 1974)。這部辭典中關於東亞的部分於1978年在美国的佛蒙特(Vermont)和日本的東京出版。1960年在布拉格創辦了一家獨特的雜誌《新東方雙月刊》(*New Orient Bimonthly*)，這家新雜誌的崇高宗旨是要促進東方與西方之間的廣泛瞭解。

1968年8月22日，第20屆中國研究大會預訂要在布拉格舉行。8月21日那天，由「戰無不勝」的蘇聯紅軍率領下的東歐五國的軍隊佔領了捷克斯洛伐克。近500名漢學家準備參加的大會被迫取消，《新東方雙月刊》不得不停刊。在其後的兩年中普實克和他的合作伙伴受到了懷疑，普實克本人和許多人被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清除出黨，他隨後更被東方研究院解僱。普實克以及他的合作伙伴的著作被列進了黑名單，不准出版或被別的文章引用。從外面來的人把這所世界聞名的東方研究院變成了為政治經濟宣傳的「服務中心」。

普實克受到的苦難超出他所能承受的範圍。1972年以後，那些人甚至不允許他跨進東方學院的大門，借口是不讓他妨礙「正常化」的過程。1968年的災禍對普實克是個打擊，他不能夠再按照他在波德斯告訴我的那樣去

生活。以後的幾年裏，他在萊普西格協助編輯《東方文學》，僅僅如此而已。他也還能見到了一些外國研究生、優秀的學生、朋友和同事。

1979年12月在接受斯德哥爾摩大學授予他的榮譽博士學位時，普實克作了一次講演。這個題為〈葉紹鈞和安東·契訶夫〉的講演可以算作他的絕筆。這篇論文是普實克少有的幾部比較研究的著作之一，他簡短地分析和比較葉紹鈞的短篇小說《秋》和契訶夫的《櫻桃園》。他認為《秋》與《櫻桃園》相似。當普實克閱讀葉聖陶的短篇小說和重讀或重新回憶起契訶夫的劇作詩，他也許是十分悲哀的。對於他自己的處境或者他國家的處境來說，他不像契訶夫那樣相信「過去的終結」；他被迫考慮的是「未來的終結」。從契訶夫《櫻桃園》或葉紹鈞的《秋》而來的悲蒼感一直伴隨普實克走到生命盡頭。

1989年11月17日事件的三個月之後，李歐梵教授在給我的信中表達了一個願望：「希望他(普實克)的英魂愉快。」在《鐵屋中的吶喊》一書中，李先生把魯迅的靈魂打入了地獄。我記得，普實克從未對我談起過地獄或天堂。普實克在他的天國之家裏一定是同他所喜歡或所研究的人們在一起：孔子、屈原、李白、白居易、話本的敘事者和創造者們、蒲松齡、沈復、劉鶚、魯迅、鄭振鐸和其他人。我個人則希望像波德萊爾所說的那樣，與普實克相會於「處於這個世界之外的任何一方」^①。

最後，也許我在此應該補充幾句關於普實克與神話和現實的聯繫。普實克和他自己的周圍絲毫不帶任何神話色彩。普實克與夏志清的衝突、普實克性格中的超凡魅力、他的雄辯口

普實克閱讀葉聖陶的短篇小說和重讀或重新回憶起契訶夫的劇作詩，他也許是十分悲哀的。對於他自己的處境或者他國家的處境來說，他不像契訶夫那樣相信「過去的終結」；他被迫考慮的是「未來的終結」。

才，以及他後來在我所形容的「未來的終結」時代裏所經受的苦難和悲慘的結局，使得人們對他產生了神話式的闡釋，但這是毫無意義。普實克是一個人，比我們中間的許多人要更為有天賦、更為勤奮。他像浮士德所說的那樣「原始有為」(Im Anfang war die Tat)，而且將畢生奉獻給了學術事業，但是他仍然擠出足夠的時間結了三次婚，有一個女兒，並喜愛孫兒輩們的陪伴。他不介意同聰慧可人的女子交往，也總是願意與同事和朋友進行認真的或是幽默的交談。現代女權主義者們也許稱他為「男性沙文主義者」，他或許是個男性沙文主義者，但是這世界上沒有完美無瑕的人。

普實克不過是個人，也許，是個太富有人情味的人。

寫於香港

1991年9月14日——

普實克誕辰85週年紀念日

註釋

①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 translated by Burton Watson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84–85.

② J. Průšek *Úvod*,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O Čínském písemnictví a vzdělanosti*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rague, 1947), p. 5.

③ J. Průšek: *Úkoly české orientalistiky v osvobozeném státě* (The Aims of the Czech Oriental Studies in the Liberated Country). *Ibid.*, p. 14.

④ Professor Průšek dedicated me an offprint of his study “La nouvelle littérature chinoise”, *Archiv orientální*, 27 (1959), I, pp. 76–95 with the sentence just quoted.

⑤ *Archiv orientální*, 25 (1957), pp. 261–83.

⑥ M. Goltz: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West. A Critical View”, *Modern China*, 2 (July 1976), p. 404.

⑦ Cf. J. Průšek: “Basic Problems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 Review of C.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T'oung Pao*, 49 (1962), pp. 357–404 and C.T. Hsia: O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 Reply to Professor Průšek”, *T'oung Pao*, 50 (1963), pp. 428–74.

⑧ J. Průšek: “O některých úkolech orientalistiky v oblasti literatury (On Some Tasks of Oriental Studies in the Literary Realm)”, *Světová literatura* (World Literature), 3 (1962), p. 152.

⑨ Published by Hunan wenyi chubanshe and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Li Yanqiao and others.

⑩ J. Průšek: “Introduction”, in *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64), p. 27.

⑪ This is an allusion to a poem in prose by Ch. Baudelaire entitled: “Any Where out of the World” from the collection *Le Spleen de Paris*.

張京媛 譯

高利克 (Marián Gálik) 1933年生，斯洛伐克著名漢學家。曾就讀於布拉格查爾斯大學，畢業後到北京大學留學兩年，回國後任職於斯洛伐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高利克的代表作有 *The Genesi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1917–1920)* 及 *Milestones in Sino-Western Literary Confrontation (1898–1979)*，另曾發表論文百餘篇。